

黔东南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主 编 / 王爱华 姚仁海

副主编 / 张雪梅 李 斌 潘年显

敬畏：
苗族神判中的
生死伦理

麻勇恒 / 著

民族出版社

•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
(项目编号: 11AZD0
“神判约束对苗族乡
(项目号: 2016gh21

“研究”
课题

JINGWEI: MIAOZU SHENPANZHONG DE SHENGMINGLUNLI

敬畏：苗族神判中的 生命伦理

麻勇恒 /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敬畏：苗族神判中的生命伦理/麻勇恒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2016.6

(黔东南历史文化研究丛书/王爱华,姚仁海主编)

ISBN 978 - 7 - 105 - 14418 - 1

I. ①敬… II. ①麻… III. ①苗族—生命伦理学—研究
IV. ①B82 - 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59591 号

敬畏：苗族神判中的生命伦理

著 者：麻勇恒

责任编辑：张义军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政编码：100013

网 址：<http://www.mzpub.com>

印 刷：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278 千字

印 张：17.75

定 价：38.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4418 - 1/B · 751(汉 261)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投稿热线:010 - 58130111 1092781806@qq.com; 发行部:010 - 64211734)

黔东南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研究中心
贵州省苗族侗族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资助出版
凯里学院人类学省级重点学科

《黔东南历史文化研究丛书》编纂委员会

总策划：李飞跃 冯仕文

执行策划：刘晓春 肖明龙 张雪梅

主编：王爱华 姚仁海

副主编：张雪梅 李斌 潘年显

委员：余晓林 陈怀利 吴先佳 贺华中

江晓谷 龙丛 吴春 范钟声

霍盛红 郑茂刚 周江菊 王芳实

曾梦宇 廖雨 吴平 石敏

肖亚丽 刘鹤 刘宗碧 陈洪波

范生姣 龙泽江 吴才茂 罗康智

总序

陈春声

对中国传统地域社会的研究者来说，黔东南真的是一块不可多得的宝地。凯里学院扎根这块民族学、社会史、人类学的沃壤近六十年，一代代学者以保护、传承传统民间文化和民族文化为己任，蒐集、整理并系统研究地方文献、民间文书、口述传说与民间惯俗，不过分追求具有宏大叙事风格的表面上的系统化，而是尽量通过区域的、个案的、具体事件的研究，表达出对地域社会与历史传统的理解。《黔东南历史文化研究丛书》的编辑与出版，真的令学界同行感到敬佩和欣慰。

我是2002年3月第一次有机会访问黔东南的，当时就深深地为这里的山河土地、风俗民情所陶醉。以后十多年间，与国内外有共同学术兴趣的朋友们一起，到黔东南进行田野考察有十余次之多，其中也包括了2015年10月凯里学院悉心安排的偏桥卫遗迹及施秉地区民族民间文化的考察之旅。徜徉在锦屏、黎平、施秉、凯里的山水之中，走在留有数百年蹄痕履迹的古老驿道的石板之上，抚摸着卫所城墙的断壁残垣，看着明代初年就从内地移居“苗疆”的军户后代跳起刚劲彪悍的龙舞；在侗乡、苗寨村口的千年银杏树下，喝着苗家的水酒，听着悠扬的酒歌；到一家一户串门，在吊脚楼里翻阅一包包乾隆朝以来一直保存的契约文书和其他文字资料；入夜后围坐在炉火周围，在忽明忽暗的火光映照之下，听妇女们以略略有点凄苦的声调唱《回香歌》；在山顶晒谷场绕着熊熊篝火，与整个村寨的人们拉着手唱歌跳舞；夜深人静之时，在苗家木楼客房的床铺上，听着楼旁山溪潺潺的流水声……这种深具“回到历史现场”意味的场景，常常历历在目，让人难以忘怀。这样的感

受，也是未曾有过类似经历的人们难以想象和体验的。正因为这样，也就对凯里学院同行们的工作，或多或少增添了一份羡慕与敬重之情，《黔东南历史文化研究丛书》所收录的多种学术著作，因为其作者们长期浸淫在这样真切的原生态的文化氛围中，自然而然就有了一种他人所难以企及的现场感和历史感。

由于共同的学术追求，多年来中山大学与凯里学院从事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研究的学者们之间多有探讨与交流，收获丰硕，而“清水江文书”的整理与研究，更使两校同行有了更好地互相砥砺、相得益彰的合作机会与研讨平台。在共同的研究实践中，我们对这块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博物馆”的土地上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有了更丰富的感知，也对黔东南传统地域社会研究与民族民间文化研究的学术价值有了更多的期待。

我们知道，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现今聚居着33个民族，民族民间文化形态繁多，内容丰富，人文与自然生态系统的保存都比较完整，尤其是苗族、侗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特色独具魅力，是世界乡土文化保护基金会认定的全球18个生态文化保护圈之一。黔东南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遗产，既在日常生活、礼仪行为和口述传说中存留了世世代代在本地生活劳作的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固有文化传统的细节，研究者又可透过地方文献、民间文书的记载和上述各种细节看到王朝典章制度和国家意识形态在地域社会的表达。在黔东南，初来的研究者不时会有“礼失而求诸野”的感慨，但更重要的是，对黔东南地域社会与民族民间文化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黔东南这个具有极大差异的地方社会，如何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国家”与“地方”的长期互动中得以形成和发生变化的，并进一步理解黔东南地区何以能够长期拥有共同的“文化”及其百姓关于“中国”的正统观念。

毋庸讳言，近十余年“清水江文书”广泛受到重视，得以大规模地蒐集、整理和研究，这是中山大学与凯里学院的同行们走到一起，共同开展研究工作的重要契机。黔东南少数民族民众珍惜、收藏文字资料的传统，使现存总数达数十万件的“清水江文书”，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史料发现之一。近一个世纪之前，王国维先生曾指出：“古

总序

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之赐”；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亦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新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同时在进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清水江文书的整理与研究”的两校学者们，正是以这样的期待来面对我们共同的事业的。令人高兴的是，学者们已经发展出一套较为系统的解读乡村社会中各种资料的有效方法，包括族谱、契约、碑刻、宗教科仪书、账本、书信和传说等，这套或许可被称为“民间历史文献学”的独具特色的学问和方法，是传统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或汉学家都没有完全掌握和理解的。我们希望民族民间文化和地域社会史的研究者们，能够在大量收集和整理民间文书、地方文献和口述资料的基础上，最终建立起自己独特体系的民间与地方文献的解读方法和分析工具，将中国历史研究建立于更坚实的学术基础之上。

凯里学院作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最高学府，在地域社会历史和民间民族文化研究中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也理所当然应在黔东南地方文化建设中贡献智慧与力量。凯里学院的同行们已经在相关领域的资料蒐集、课题研究、课程建设、政策咨询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而《黔东南历史文化研究丛书》的编辑与出版，更是一个新的开始。

是为序。

于广州康乐园马岗松涛
二〇一六年七月九日

代 序

神圣与生命：人类文明的敬畏之道

张小军^①

敬畏，或许是一种正在远离我们的文明……

从我记事的那个年代，“敬畏”一词似乎对我们这代人就是陌生的。我们的那个年代，倡导的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人定胜天”“战天斗地”的口号响彻云天。也许，我们应该珍惜那个有牺牲精神、有热血沸腾的年代，但很遗憾，命运注定那一代最终是盲目崇拜和扭曲革命的牺牲品，这种盲目和扭曲的“大无畏”——后面则是大无知，伴随着一代人的成长，不仅害了这片土地上的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更伤了几千年积淀的中华文明。

这几天盛传据说是杨绛先生的《百岁感言》，读罢颇有感动。杨绛先生是无畏的——她平淡地面对即将告别的人世，平淡地面对即将的“回家”。同时，她又是深含敬畏的——一种高尚的敬畏，她这样说道：

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

杨绛先生希望干净地“回家”，希望把在现世百年中的污秽荡涤出心灵。正是这样的道德敬畏，让她能够以无畏的精神，去检讨自己人生

^① 张小军，男，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

中也许并不英雄、甚至不仁不义的逃避、懦弱。本来，这一类中国士大夫惯常的避世或隐逸文化已经是很“干净”很脱俗的，先生却依然带着对纯真道德的敬畏，惧怕自己的哪怕是一点不净，让自己的“回家”变得永远不能安宁。如今，先生已经安静地走了，对于今天活着的我们，该如何以先生那种高尚的道德敬畏去延伸我们的未来之路？

文化人类学之父泰勒在 1871 年的《原始文化》中给出了“文化”的如下定义：

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志意义而言，是包括了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们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习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合整体。

泰勒把文化与文明视为同一，这在那个年代意味深远。在其“文明”的定义中，没有科学技术，没有现代化，更没有资本主义。文明首先是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继而是人们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习得的能力和习惯。这些文明知识、信仰、艺术、道德等等“文明”或“文化”似乎离我们很近，又离我们很远。杨绛先生在写出下面这段百岁老人的内心酸楚时，恐怕在心里还怀着对人生的深深遗憾：

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

先生大概终究没能明白，上面的世界并不代表人类历史，只不过是所谓“现代”社会的弊端。我们身边发生的不文明和“没文化”行为比比皆是，令人不寒而栗。我们自以为生长在文明社会，一切都很文明。殊不知，我们在某些方面远不及初民。初民社会共享、共生、共

有，是“一家人”的文化，其中一些文明智慧可说在今天的社会之上，“神性”便是其中之一。

本书研究的神判制度就是一例。在苗族地区至今留存着神判制度，它是依赖“天理”的制度。社会学通常讲三种社会规范：伦理道德、乡规民约（民俗习惯）和法律法规。这三种规范一种比一种约束性更强。初民社会不需要法律，依赖前两种规范就可以把社会秩序“搞定”，神判制度可以说是属于前两者的结合。现代社会以法律为傲，殊不知那是伦理道德和民俗习惯管不住的现代社会之结果。换句话说，现代社会的秩序难以靠道德来解决，才会发明出高秩序成本的“法律”来。但是，没有道德基础的法治，是不可能解决社会治理的，这个浅显的道理至今很多人尚不明白。

依靠天理（联系到宗教和巫术等）的神判制度在世界上曾经十分普遍。类似的例子在中国也很多。例如，在山西就有许多水神庙，水神庙的主要功能就是以神威和神判来管水治水。我曾研究的介休洪山泉源神庙就是一座水神庙，村里曾经流传着一个“五人墓”的故事：

原来洪山源神池的水没有统一的管理，因此人们常常为抢水而争斗。后来人们想了一个办法，用一口大锅把油烧得滚热，里面撒上 10 个铜钱，各村派代表来捞。约定哪个村子捞上来几个铜钱，那个村子就得几成水。结果，洪山村有 5 个人冒死从滚烫的油锅中捞出 7 个铜钱，让洪山村可以享用 7 成水。而 5 个被烫死的人则被厚葬在源神庙后的山顶上。

这个故事也以类似的方式和不同的版本流传在山西其他地区，反映出山西的乡村社会在某个缺水年代界定水权的惨烈和代价，背后则是一种常见的“滚水神判”行为，它说明了一种以天然神判来决定水权的天理。

类似地，菲律宾的伊富高族的神判也是如此：

在菲律宾的伊富高族，刑事案件和财产纠纷之类的民事案

件常用神判来解决。被控诉犯有某项罪行者如果坚持不认罪，就会被送去神判；原告会向被告挑战，要他证明自己的无辜。被指控的个人或团体如果拒绝接受神判，就表示确实犯错了。

伊富高族有好几种神判的形式。在滚水神判中，被试者得把手伸进滚烫的一锅水中取出砾石，再拿一块放回去。无论采用哪一种测试法，如果被试者有罪的话，他的手就会严重灼伤；如果无罪的话（在财产纠纷的例子中对的一方）就不会严重灼伤，这时原告（或对手）就得付出赔偿。（参见基辛《当代文化人类学》）

以上的神判包括了试罪的内容，神判（ordeal）的词根是“ord”。相关的词有 ordain：（命运）注定；ordeal：神判、试罪法；Ordinance：有法令、传统的风俗习惯、神或命运注定的事等含义；order：秩序、规则、礼法等。不难理解，神判具有依靠天命来安排人间“秩序”的清楚含义。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 levi - strauss）在他的《野性的思维》中曾经说道：

我们称作原始的那种思维，解释以这种对于秩序的要求为基础的，不过，这种对于秩序的要求也是一切思维活动的基础，因为正是通过一切思维活动所共同具有的那些性质，我们才能更容易地理解那类我们觉得十分奇怪的思维形式。

以“秩序”这个社会学鼻祖孔德（Auguste Comte）在社会学之初就十分重视的概念，可以容易地理解巫术、宗教、神判这类现象为什么在人类社会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基础功能。

麻勇恒作为苗族一员，对神判等文化有着特殊的情结。他的博士论文从信、德、理的视角理解神判后面的敬畏文化，可谓一个有意义的探索。作者最终将敬畏置于生命伦理的视角展开考察，认为敬畏及其神性是生命伦理的基础之一，并将神性纳入人性的思考，强调过往研究片面强调理性等维度而忽略了人性中“神性”的重要作用。作者认为：

在苗族的生命观里，生命是一种神性的存在。然而，当今人类所处的世界是一个被高度“商业化”“世俗化”与“科学化”了的世界。因此，生命在人们的眼中似乎仅仅是一堆由特殊的物质结构聚合起来的有机物，并因此丧失了神性，生命可以被肢解、伤害。尤其在价值理性的遮掩下，人类的自私自利、贪欲得到了极度的张扬，以至于形成了对神性的压制。于是，一切变得没有神秘感，一切变得没有敬畏感。原本让人敬畏的权力、法律如今更多地成了人们试图驾驭的工具罢了，而工具化了的权力，常成为某些人群用以谋私的利器，并滋长着欲望。这些因神性消解而产生的问题，让我们不得不反思理性、神性的关系。

敬畏首先要有“敬”，由敬生畏，而不是盲目地畏惧。信的信仰，表达的是一种神圣性。神圣性首先联系到天理，又联系到道德和道理。《尔雅·释诂》释“神”为“慎”。《毛传》：“慎，诚也。”“慎”解为真心，真诚，这是神性之德。没有神性，就没有真，也就不会有当今社会大量的造假。上面所述生命的神圣性是人性中的一部分，这自然不是“理性人”之类的理论能够解释的。要理解“神性人”的重要，首先要理解“宗教”“信仰”乃至“神判”一类现象的神性。透过这些，最终要落到人类行为的深层编码体系（可以类比为人类行为的“软件”）——文化秩序。对于这一点，潘光旦先生早就有深刻的见地，他在民国廿四年（1935）发表的《宗教与优生》中就指出：

谁都承认宗教是一种很伟大的势力，不久以前，我们到一个很破落的小乡村里去放一些贷款。这个村子里只有50来家，想借钱还债或做小本生意的在半数以上，经济能力的衰落是可想而知的了。但是说也奇怪，村中唯一的一座庙宇确是修得很整齐，是最近修的，并且那笔修理费并不比我们贷款的总额要小。我们当然可以说，神道的榨取力比任何人的力量还要来得

大，但我们也可以说，信仰对于人事的影响确乎是可以大到无坚不摧、无微不至。

然则所谓有意义有价值的宗教信仰也不过一种能促进人生——尤其是群的生活——，使其日益精深、高明、博大的文化的努力罢了。而这种意义和价值，也就是优生学术所研求，而希望其他的文化的努力所能自觉地采取、容纳而加以发挥的。

在“文化秩序”的意义上理解神判，便不会陷入简单化的“迷信”学术批判。并且可以说，其神判背后的“天理”高于人事、“天理”之下的人人平等和民主，是人类社会在这个地球和宇宙生存的基础伦理。人类应避免继续“伤天害理”，做出那些“天理难容”之事。相信人类有能力去寻找他们丢失的“文化”，践行清华请自《周易》的经典校训，其中道出了如何以天地之理、乾坤之道来指导做人行事的道理：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作为麻勇恒的导师，我很高兴他的博士论文能够出版。麻勇恒在清华的博士课程只用了3年，从严格的人类学学术能力的训练上，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时间。尽管如此，麻勇恒还是以加倍的努力取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并圆满完成了关于神判制度的博士论文。对于这本基于博士论文的研究论著，恐怕还有一些缺憾有待进一步完善。不过比出版机会更为重要的，是本书的主旨对于今天的社会有着深刻的启示，它的早日出版或许能够给读者带来更为有意义的影响。我期待勇恒能够继续在学术的道路上严谨治学，继续将人类学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也传递给更多热爱人类学的读者们。

2016年6月2日
于清华园

序 一

张雪梅^①

2016年5月17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院工作座谈会时强调指出，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入又一个春天的重要标志。在习近平总书记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指导下，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大繁荣的新时代正在迎面走来。

实际情况说明，精神困顿、心智锁闭、知行不合，往往是后发地区突出而又常被忌讳的“短板”。要补齐这一“短板”，需要从哲学社会科学的智慧宝箱中寻找良方，需要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文化精品力作，激发创新发展之锐意，激励攻坚克难之信心，为我们落实“四个全面”和“五大发展理念”，创造新的文化条件，增添新的精神动力。因此，麻勇恒博士请求为他的著作《敬畏：苗族神判中的生命伦理》作序，我欣然答应。

麻勇恒博士是清华大学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张小军先生的高足，是凯里学院的学术骨干、凯里学院省级重点学科——人类学学科带头人。无论是从他的师门名望的角度出发，还是从促进凯里学院乃至黔东南州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角度出发，我都应当对麻勇恒博士的著作问世表示祝

^① 张雪梅，凯里学院副院长，三级教授，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研究。

贺，并以此表明，我非常期待凯里学院的学人，在已然来临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春天尽情绽放，展示出强劲的学习力和思考力，在展现才华、贡献智慧的精彩过程中立身、立功、立言、立德。

麻勇恒博士的这部著作，研究的对象是苗族神判，是苗族传统法文化或信仰文化的基础命题。虽然该著作研究的是一个冷门的问题，揭示的是苗族文化内在逻辑的微观道理，但这项研究很“接地气”，具有理论原创性。其所列举的案例，都是发生在苗族地区的真实事件，而非传说故事；其所运用的分析工具，既秉持文化人类学的“正宗”理论与方法，又始终尊重苗族元哲学的逻辑程式，思维很活，视野很广，切入很深，功夫很实。因此，该著作学理性强、实证性强、逻辑力强，是一个值得同行学人尊重和利用的学术成果。

社会需要科学，科学需要社会。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获得超越书本的习得，必须深入基层、根植基层。基层不是一个平面或一种类似于荒野的园地，基层乃是一个有深度、有厚度的广阔空间，基层不乏活力、不乏智慧、不乏知识，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升理论实用性、提高主观能动性、提纯服务发展自觉性的必要场域。只有拿得出能够让国际认同、国家认可、社会认定的高质量成果的人，才有可能得到基层的倚重，才有可能“为人民做学问”，做人民群众需要的学问，成为人民群众信得过、靠得住、用得上的社会科学工作者。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是以学习力与思考力服务社会、促进发展的工
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只要心中有家国、有社会、有民族，善思笃行，必可凭借自己的学习力与思考力，独自深刻、造福社会，以其思想智慧和学术成就，积善成德、积劳成功。

及物咏唱，借题寄语。知行合一，应有和声。

谨以为序。

2016年5月26日

序 二

李文明^①

神判是苗族社会自我管理体系的一个部分，它普遍存在于苗族的历史和当今的现实生活中。神判的历史悠久，它既是一种法律、一种制度、一种社会管理的手段，又是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它在苗族几千年颠沛流离的社会历史长河中，起着维系民族内部团结、凝聚人心、维护公平与正义，进而确保社会秩序和谐稳定，促进繁荣发展的积极作用，让一个丢失了文字的民族没有灭亡于江湖，功莫大焉。

神判，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指的是对某件纠纷进行了断的仪式，这种仪式的内涵十分丰富，既有信仰方面的，也有心理方面的，还有道德、天理、义气、良心、诚信、家族的集体荣誉、尊严、人格等等多种文化因素与文化寓意。广义指的是社会生活或个人生活中各种各样有求于神或者看神的脸色行事的各种活动，这种活动充斥于苗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同样包含有狭义神判的文化因素与文化象征。

神判的起源应该是苗族万物有灵观念，他们崇拜自然、崇拜神灵、崇拜祖先，敬畏天地，认为无论做什么事情，人看不见天看见，活人看不见祖先和神灵看得见，总有一双无形的眼睛在保护和监视着人们的一举一动，谁如果超越了界限，就会得罪神灵、得罪祖先，他将会大难临头。而神判的“灵验”让人们对神产生敬畏之心，进而推进神判这一制度的神圣化和神秘化，并具有超强的执行力。

^① 李文明，男，苗族，黔东南州志办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黔东南州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从事苗族文学研究。